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 SIÈCLE

Fernand Braudel

十五至十八世纪的
物质文明、经济
和资本主义

第一卷 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顾良 施康强 译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十五至十八世纪的 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一卷 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顾良 施康强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1卷,
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 /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
顾良,施康强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2017.11 重印)
ISBN 978-7-100-13052-3

I. ①十… II. ①费…②顾…③施… III. ①资本主义社
会—发展史—研究—世界 IV. ①K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1821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 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一卷

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顾良 施康强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3052-3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27 $\frac{1}{2}$ 插页 2
定价:115.00 元

Fernand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 siècle*

tome 1

*Les Structures du Quotidien:
Le Possible et l'impossible*

Fernand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 siècle
 tome 1: Les Structures du Quotidien; Le Possible et l'impossible

© ARMAND COLIN, Paris, 1986, Fourth Edition.

ARMAND COLIN is a trademark of DUNOD Editeur-11,

rue Paul Bert-92240 MALAKOFF.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巴黎迪法国际版权代理(www.divas-books.com)

中译本根据阿尔芒·科兰出版社 1979 年版译出

LA DYNAMIQUE DU CAPITALISME

©Editions Flammarion, Paris, 2014(first published in 1985).

《资本主义的活力》根据弗拉马里翁出版社 2014 年版译出

资本主义的活力(代译序)*

关于物质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再思考

为了《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部雄心勃勃的长篇论著，我在1950年就开始了构思，算来距今已经多年了。当时，吕西安·费弗尔正筹备出版一套题为《世界之命运》的通史丛书，是他向我推荐了或毋宁说友好地指定了这个题目。当丛书主编于1956年去世后，我不得不勉为其难，把他撂下的担子挑了起来。吕西安·费弗尔本打算亲自撰写《十五至十八世纪西方的思想和信仰》，他的书和我的书本应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和互相呼应；不幸的是，他的书将永远出版不了了。我的书也就永远丧失了伴侣。

虽然本书总的说来仅限于经济领域，但它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因为需要拥有的资料极其庞大，主题本身——经济显然不能单

* 此“代译序”内容是作者布罗代尔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作的三次演讲。文章曾以《关于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的再思考》为题译成英文；随后又译成意大利文，标题是《资本主义的活力》。该演讲是在阿尔芒·科兰出版社出版《十五至十八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1979年版)前发表的。在该书行将撰写完毕时，作者接到了邀请，要他对该书作概要的介绍。译者认为以它作为这部中译本的序言最为合适不过。

独存在——又惹起众多的争议,正在不断演变中的历史学——历史学势必要兼并其他人文科学,虽然兼并过程相当缓慢和不无阻力——又制造无穷的麻烦。这种尚待分娩的历史学每年都有花样翻新;我们在后面紧紧追赶,打乱习惯的工作程序,尽量去适应不断变化中的要求和怂恿。至于我,听着航船的汽笛鸣叫声,真是感到十分高兴!可是,多少年过去了,航船却迟迟进不了港口,让人等得心焦。撰写《地中海》一书大概花了我 25 年时间,《物质文明》也将近有 20 年。真是拖得太久了,实在太久了。

—

所谓经济史至今还处在草创阶段,难免要遇到一些偏见的反对:经济史的身份不高贵。高贵的历史是吕西安·费弗尔建造的那条船,船主不是雅各布·富格尔,而是马丁·路德,还有弗朗索瓦·拉伯雷。无论高贵或不高贵,或不如别的高贵,经济史迟早要提出我们历史行业必定遇到的所有问题。从某个角度看,经济史包括人类的全部历史,它既是雅克·克尔、约翰·劳这类公认的大人物的历史,又是重大事件、机遇和危机的历史,最后还是在长时段中演变的、有结构的深层次历史。我们的困难就在这里:这段历史牵涉到四个世纪和整个世界,怎么可能把如此众多的事实和解释组织起来?不能不有所取舍。我选择了长时段的内在平衡和不平衡。因为,在我看来,前工业化时期经济中最重要的东西,正是迟钝刻板的初级经济与范围狭小、但又生气勃勃的现代化发展同时并存。一方面是村庄中的农民,他们几乎过着自给自足、自由自在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如油珠一般向四处扩散的市场经济和

资本主义,制造业的逐渐发展开始显现今日世界的雏形。可见,这里至少有两个天地,两种不同的但在总体上又互为解释的生活方式。

我决定先从迟钝的一面着手:乍一看来,混沌的历史还处在人的清醒意识之外,人类行为的被动胜过了主动。本书的第一卷正是试图说明这种状态。当该卷于1967年首次出版时,我曾想用《人在应付日常生活时的可能和不可能》充当标题,后来才改作《日常生活的结构》。标题并不重要。这是一次成败未卜的探索,其中可能存在许多缺点、疏忽和误解,但研究的对象却是最清楚不过的了。这里使用的语汇——无意识、日常生活、结构、深层——本身确实都很含糊。尽管本书会涉及心理分析的无意识,并且需要发现某种集体的无意识——无意识的实在曾使卡尔·古斯塔夫·杨格伤透脑筋,但这里从事的研究却不可能是无意识。从细小的方面去研究一个大题目,至今还是少有的事,这件事正有待历史学家去做。

在我这方面,我遵循了一些具体的准则。我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是我们在生活中不知不觉地遵守的习惯或者例行公事,即不下决心、不加思考就到处风行和自动完成的成千个动作。我相信人类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泡在日常生活中。无数流传至今的和杂乱无章、不断重复的动作正帮助、束缚和决定着我们的生活。出人意料的是,这些冲动、激励、榜样、行为或义务往往可以追溯到最古老的时代。亘古至今的生动现实,犹如流入大西洋的亚马孙河一样,滔滔浊浪,千古不尽。

我试图用“物质生活”一词概括所有这一切。正如其他含义过

广的词一样,这个词的使用虽然比较方便,但有不够贴切的缺点。无论是创造发明或墨守成规,物质生活当然只占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对于这种被动甚于主动的生活,我最初并不想确定它的范围或本质,我只想观察、研究、熟悉和展现它那平凡、宽广和通常被忽视的历史。

只是在进入了历史海洋以后,走出历史的时机方才来到。我从这次海下探索中得出了一个直接而深刻的印象:在某种程度上,历史的古老是无法用年代计算的;二百年或一千年以前的事,我们今天有时候也能够亲眼目睹。我所说的这种物质生活已在以往的历史过程中被纳入到人类的生活之中,就像腑脏生在人体内一样;对人说来,过去的经验或感受已经变成了生活中屡见不鲜、势在必然的习惯。任何人对此都不加重视。

二

以上是我的第一卷书的基本思路;其目的是为了进行一次探索。各章的内容从小标题就能看出,这些小标题罗列了推动物质生活进步的各种隐蔽力量,人类的全部历史就建筑在这些隐蔽力量的基础之上。

第一章讲的是人口数量。如同所有生物一样,人类的繁殖主要靠生理力量的推动,即乔治·勒费弗尔所说的“春季的向性运动”。但也还存在别的推动力,别的决定因素。不断更替中的人类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整个活着的人的命运,虽然具体的个人并不能意识到。在这样或那样的一般条件下,人口有时太多,有时不够多,人口运动趋向平衡,但很少真正达到平衡。欧洲自1450年起

人口急剧增长,因为黑死病当时已经过去,上个世纪的巨大损失有加以弥补的必要和可能。复原过程将一直延续到下次退潮。这种在历史学家看来似乎可以预测的潮汐运动直到18世纪依然有效地存在。只是到了18世纪后,不可能的界线终于被突破,至此不可逾越的顶点终于被超过。从此,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再也没有出现过停滞或倒退。今后是否将会出现倒退呢?

总之,到18世纪为止,人口体系被关在一个几乎密闭的圆圈里。刚要碰到圆圈,马上又出现退缩。恢复平衡的方式和机会真是不少:匮乏、灾荒、饥饿、生活困苦、战争,尤其是一系列的疾病。疾病今天还在危害人类;它在过去曾是可怕的灾难:定期流行的鼠疫只是在18世纪才向欧洲告别;斑疹伤寒在寒冬把拿破仑大军困在俄国;伤寒和天花经常肆虐;原在乡村流行的结核病于19世纪在城市猖獗,成为不折不扣的浪漫症;最后是性病,自从美洲被发现后,由于几种病菌相汇合,梅毒突然又重新冒头。卫生条件差和水质恶劣导致了其他疾病。

人刚出生时抵抗力很弱,难以躲过疾病的袭击。婴儿死亡率很高,某些不发达国家至今仍是如此;那里的一般健康状况也很差。我们拥有16世纪的几十份病历。那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躯体畸形,皮肤坏死,寄生虫在肺部和内脏繁殖,这类情形能使今天的医生惊诧不已。可见,直到不太遥远的过去,不卫生的生活条件仍无情地支配着人类历史。人们不禁要问:当时的人口是多少?生的是什病?能不能制止疾病的危害?

随后几章提出了其他的问题:当时的人吃什么?喝什么?穿

什么?住什么?为了回答这些棘手的问题,我们必须作一次探险旅行;大家都知道,在传统历史的书本上,人是从来不吃不喝的。虽然有人在很久以前曾说过:“什么人吃什么东西。”但这句成语也许主要是利用德语的方便玩一次文字游戏而已。我以为不应该把糖、咖啡、茶、烧酒等许多食品的出现贬低为生活细节。它们分别体现着无休止的重大历史浪潮。当然也不应该夸大在过去食物中占主要地位的谷物的重要性。小麦、稻米和玉米是经过以往无数次试验才终于作出的选择,作为千百年“左右摇摆”(法国伟大的地理学家比埃尔·古鲁的名言)的结果,它们已变成了文明的选择。小麦十分消耗地力,迫使土地定期休息,畜牧业的发展因此成为必要和有了可能:假如没有家畜以及畜拉的犁和车,我们怎能想象欧洲的历史?稻米是一种园田式集约耕作的产物,人不给牲畜留任何草地。玉米种植最为简便,也最容易让人填饱肚皮;由于农闲时间较多,农民就以劳役形式从事美洲的庞大建筑工程。剩余劳动力被社会所吸收。我们还可以讨论当时的粮食消费量及其提供的热量,研究各个时期的食物匮乏以及饥荒的演变。与查理五世皇帝的命运和所谓路易十四的盛世(昙花一现的和很不牢靠的辉煌)相比,这些题材难道不同样令人振奋吗?我们的讨论具有深远的意义:烧酒、烟草是自古已有的毒品,它们的历史,特别是烟草的风行全球,难道不预示着今天出现更危险的毒品吗?

在技术问题上,也必定得出类似的认识。这确实是一部美妙的历史,它与人类的劳动,与人在同外界和同自身作斗争中取得的点滴进步不可分割。人类自古以来的一切努力——突飞猛进的和不厌其烦的努力——都是技术,不论是用石、木还是铁制造工具和

武器。技术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一种本质上保守的、变化缓慢的活动;作为技术的上层建筑,科学只是后来才慢慢置于技术之上。大规模的经济集中需要技术手段的集中和技术的发展。例如15世纪威尼斯的兵工厂,17世纪的荷兰和18世纪的英国。科学尽管姗姗来迟,但每次都前来赴约,它是被强力拉来的。

各种技术和各种科学因素历来都周游列国,互相交换,不断传播。但是,舵舵、搭接式船壳、船载火炮和远洋航行这类组合技术却很难传播,总括种种工艺、技巧、习惯和成就的资本主义也同样如此。欧洲霸权的确立正是由于远洋航行和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难道事情不就是这样简单吗?

大家或许会问:为什么你在最后两章写了货币和城市?我确实不想把这两个问题留给下一卷。但单说这个理由显然是不够的。其实,货币和城市的发源地既在遥远的古代,又在不久前的近代。作为促进交换的手段,货币是一种十分古老的发明。没有交换,就没有社会。至于城市,它在史前时期业已存在。货币和城市几千年来始终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又是能够适应变化和有力地推动变化的加速器。也许可以说,城市和货币制造了近代生活;按照乔治·古尔维奇喜爱的相互性法则,近代的生活浪潮反过来又促进了货币的发展,巩固了城市的专横统治。货币和城市同时是发动机和指示器,是变化的动力和信号,而且也是变化的结果。

三

作为“历史的缺席主角”,习惯和常规是个范围不易确定的辽

阔王国。习惯侵入整个人类生活的领域,犹如夜色布满整个画景一样。但是,这个无记忆、无意识的阴影同时包含着黑暗程度不一的几个区域。关键在于如何在黑暗和光明之间,在照章办事和清醒决定之间划条界线。有了界线,观察者就能区分上下左右。

不妨假设一个特定地区,它所拥有的初级市场如同成群的细小黑点分布在宽广的地面上,每个市场的营业额往往不大。横在生产和消费两大领域之间的交换(即我们所说的市场经济)正是通过这些众多的渠道进行。在1400至1800年间,旧时代的市场经济尚不完备。至于它最早的起源,在时间的夜幕下显然已不能辨明。市场经济至今也还不能把全部生产和全部消费连接起来,相当一部分产品由生产者及其家庭或本村人直接消费,不进入市场流通。

在正确地看到这种不完备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市场经济正在发展,它在城镇之间建立的联系足以开始组织生产,并指导和决定消费。事情当然需要几百年时间才能做成,但在两个世界——生产和消费——之间起着联系和推动作用的市场经济,却将在它那狭窄而又活跃的区域里,造就出种种动力和活力,种种新事物、新觉醒和新主意,进而加速经济的增长和进步。我喜欢卡尔·勃林克曼的说法,虽然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经济史归根到底是市场经济从产生到将来可能结束的历史。

因此,我长时间地观察、描绘和再现我能接触到的初级市场。初级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门槛。留在市场之外的一切产品只有使用价值,进入市场大门的一切产品具有交换价值。生产者个人是否进入交换或经济生活的范围,就看他站在初级市场的此岸

还是彼岸。我使用了经济生活一词,这是为了把它同物质生活对立起来,为了把它同资本主义相区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讨论。走街串巷的流动工匠和修椅子、捅烟囱的小手艺人尽管省吃俭用,仍然属于市场的世界,因为他们必须从市场购买每天的食物。他们与农村保持联系,收获季节回乡下去干农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走出市场的世界。甚至农民也把部分收获作为商品出售,转而购买用具和衣服,这里又属于市场的范围。去镇上卖掉几个鸡蛋或一只家禽,换得的钱用来纳税或购买犁铧,这只是沾了市场的边,但还留在自给自足的大范围内。在街上或乡下出售零碎商品的小贩应列入交换一栏,他们必须计算盈亏,无论交换和盈亏的数目是何等的微薄。店铺不折不扣地属于市场经济。出售自制产品的铺主叫作工匠主;出售他人产品的铺主进入商人的行列。店铺总敞开大门,有随时都能从事交换的好处,而集市则每星期只交易一两天。尤其,店铺意味着交换加信贷,铺主进货和售货时都行赊欠。这里的交换还掺杂着一系列债务和债权问题。

在市场和初级经纪人之上的交易所和交易会(前者每天开业,后者定期举行,历时数天,会址固定,间隔时间较长)起着更高一级的作用。一般情况下,交易会也对小商人开放;但它毕竟像交易所一样受大商人控制,这些大商人不久被称作批发商,不兼零售业务。

在本书的第二卷(题为《形形色色的交换》)的前几章里,我冗长地描绘了市场经济的这些不同成分,并尽可能把事情解释清楚。我也许过分地乐此不疲,读者大概会觉得我有点啰嗦。历史应着重描绘、观察和分类,而不应先入为主,这样难道是不对吗?力求观察和展现,在可能条件下,做到亲眼目睹;我的任务也就完成

了一半。我敢向诸位保证,在欧洲——我说的不是美国——的城市里,还不难看到以往的店铺或街头集市的外貌,不难听到小贩讲他如何到处兜生意,不难见到交易会或交易所。诸位不妨去巴西内地的巴依亚,去卡比利亚或去黑非洲,那里可以亲眼看到古老的市场。如果愿意阅读,还有成千上万件文献谈到以往的交易:城市档案、公证文书、警察局的卷宗以及众多的游记,画作还不包括在内。

举威尼斯为例:在这个奇迹般得以完好保存的古城市逛上一圈,再在档案馆和博物馆停留一段时间,过去的景象几乎全都再现在你的眼前。威尼斯如今没有交易会,或不再有商品交易会:耶稣升天节的“桑萨会”是个节日,圣马克广场摆满了临时货摊;沿圣尼古拉海滨,人们佩戴面具,奏着音乐,举行总督和大海的传统婚礼。圣马克广场设有几个市场,主要出售珍贵的首饰和裘皮。但是,大商业过去和现在都集中在与“贸易货栈”(今天的威尼斯中心邮局)隔桥相望的里亚托广场。1530年前后,家门面对大运河的阿雷蒂诺以观赏过往船只为乐,这些满载甜瓜、水果的船从近海各岛驶往市中心;里亚托广场(有新旧里亚托广场之分)是市内最活跃的商业中心。广场上摆满了喧闹的货摊;离广场不远处是建于1455年的商会,当地大商人每天上午在这座交易所里洽谈航运保险、运费和各项贸易业务,有时也与外国商人签订合同。往前走两步就到门面很窄的银行,那里随时可用转账方式当场结清货款。菜市和鱼市也在附近,就在今天这个老地方。再往前一点的街区是肉市,附近有肉铺店主光顾的圣马蒂奥教堂,在19世纪末已遭破坏。

我们对17世纪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嘈杂声或许不太习惯,但

今天的经纪人如有兴趣阅读霍赛·德拉·维加的《混乱中之混乱》(1688年),我想他会毫不困难地注意到,在当时买空卖空的股票交易中已出现签发期票、溢价贴现等近代的复杂花招。在伦敦交易所街的著名咖啡馆里,也可见到同样的狡诈手腕和侥幸弄险。

我们的罗列就到此为止。为简单起见,我们把市场经济分成两类:低级的一类包括集市、店铺和小贩;高级的一类有交易会和交易所。作为本次演讲的结论,我想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些交换手段何以能帮助我们概略地说明15至18世纪期间欧洲经济的曲折进程?第二个问题:通过比较它们的相似处或不相似处,这些手段何以能向我们显示至今还不甚了解的非欧洲国家的经济活动方式?

四

首先,关于西方在15、16、17和18这四个世纪里的演变。

在15世纪,尤其在1450年后,由于工业品价格上涨和农产品价格下跌或保持原状,城市经济有了普遍的恢复,城市的恢复比乡村更加迅速。当时,工匠铺和城镇集市,尤其是后者,无疑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正因为如此,这次经济复苏在经济生活的底层表现得特别突出。

到了下个世纪,由于经济发展恢复了原有速度(黑死病发生前的13和14世纪曾是加速发展的时代),由于大西洋经济的扩张,经济结构正变得更加复杂;推进经济发展的原动力那时是国际交易会:安特卫普、贝亨奥普佐姆、法兰克福、坎波城和里昂都有交易会,里昂一度曾是西方的中心。后来,还有1579至1621年间的贝

桑松交易会,特别新奇的是这个所谓交易会只做现金、信贷和期票的生意;在这40多年里,热那亚人曾是国际货币活动无可匹敌的主宰。生性谨慎的雷蒙·德·罗佛平时很少以个别推断全面,但他毫不犹豫地声称,16世纪是大交易会的鼎盛时期。16世纪的经济高涨,说到底,意味着交易会 and 交易所的生意兴隆;美洲贵金属的来到,汇兑体系的建立,更促进了这一上层建筑的繁荣和发达,推动了大量信贷证券的流通。热那亚银行家的这一杰出成功十分脆弱,后由于种种原因于17世纪20年代土崩瓦解。

17世纪的经济生活在摆脱了地中海的诱惑后,开始向广阔的大西洋地区发展。人们往往把这个世纪说成是经济停滞或倒退的时期。这个说法显然必须加以修正。毫无疑问,16世纪的突飞猛进虽然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已经停止,但阿姆斯特丹的惊人高涨毕竟不是经济萧条的表现。历史学家无论如何以下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经济生活仍然活跃,只是市场经济又回到了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原有基地;从这一决定性转变中,荷兰及其船队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得益匪浅。交易会的地位被交易所和商埠所替代;交易所和商埠与交易会的不同正如普通店铺与市镇集市的不同一样,换句话说,前者具有连续性,后者则是间隔的会面。这是众所周知、极其普通的历史常识。但是,问题并不仅仅涉及交易所。阿姆斯特丹的光辉很可能使我们看不到较为平凡的成果。17世纪实际上也是店铺繁荣兴旺的时期。作为连续性的另一次胜利,店铺在欧洲成倍增加,形成了密集的购销网。洛普·德·维加(1607年)在谈到黄金时代的马德里时说:“那里的一切都变成了店铺。”